清史纂修·纪念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

为史家塑像　为精神立碑

——读孟东明新著《戴逸传》

沈秋农

戴逸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我国清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70多年间，戴逸先生坚持教研并重，一生桃李满天，春晖四方，成果无数，贡献卓著，在海内外史学界均有巨大影响，无论其门生弟子，还是史界同仁及广大社科工作者、文史爱好者都热烈期盼能有戴逸先生的传记问世，以期嘉惠学林，泽润后世。而由孟东明先生撰著的《戴逸传》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2023年5月隆重推出，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浏览之下认为该传记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广征博览，精选细裁，悉心构撰

写非虚构作品的一个重点就是求真求实，写人物传记犹是如此。诚如专家所言："传记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文类，真实是它的生命。作者要对具体的传主负责，而非对带有普遍性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负责。""也就是说，记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不能凭主观的想象和个人意志，要以事实为依据。"传主从初中开始就有作品在报章发表，从事史学研究后发表的学术性文章就有800多篇，个人著作四五十种，发表的讲话和访谈类作品也有好几百篇。为做到广征博引，精选细裁，作者除广泛搜罗、细加浏览外，仍不满足。资料虽多，总有缺失之处，尤其是如何做到写人写心、形神兼备，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于是作者又20次采访传主，常常带着问题去，满怀收获归。此外，作者还多次采访传主子女，听他们讲述心目中的父亲；采访传主的同窗故交，点点滴滴，弥足珍贵。此外，作者还研读了大量地方文献典籍，将人文历史稔熟于心，对党史国史及时政要事也细加研究，从而对传主的生活环境、工作生涯、心路历程作了深入品味，这才将传记所需的各种资料、素材一一搜集齐全。与此同时，为撰写传记而整理的传主生平年表、传记的架构设计也日益完善，最终将《戴逸传》设定为上下两卷，另增附录一卷。

传主是声名远播的历史学家，作者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史学和新闻有其共同点——求真，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所谓隔行如隔山。作者虽有捕捉新闻的敏锐性和写作的概括能力，但对史

[收稿日期] 2023-10-17
[作者简介] 沈秋农（1952—　），男，中国清史南方研究院研究员，常熟215500，375500653@qq.com

学的专门知识却无法一蹴而就，但作者并未因此而畏难却步，尤其是《戴逸传》的下卷“生命之安宅”，需直接、全面、深入地记叙传主如何担纲纂修清史这一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对作者而言无疑是重大考验和挑战。作者思虑再三，以抓大放小、聚焦创新、解析悬案、厘清亮点为指导思想，谋篇布局，为读者介绍了传主为清史工程的艰辛付出与卓越贡献。览读“后记”和聆听作者在“《戴逸传》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感到作者为写好《戴逸传》是下了苦功的，如为了写好“百年洗尘看科研”这一章，作者不仅在一个月内将 50 余万字的《清光绪帝死因鉴证》深读三遍，又专门采访了“清光绪帝死因研究”课题组的多位专家，“为展示清代历史上最大冤案光绪帝被毒死的死因，专题组主持人钟里满花 5 小时给笔者一一解析”。在此基础上，作者再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将光绪帝的真实死因理了个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做到既具真实性、史料性，又富科学性、故事性，从而将长达一百年的历史悬案做了个完满终结。而传主为这个长达五年的专题性研究的拍板、推进、结案，自始至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认为“课题组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是载入史册的工作”。仅此一例，就足见作者对传记真实性准则的高度重视。围绕传主的生命足迹、治学治史的成功与坎坷、待人处事的风采风格，尤其是纂修清史的重点、亮点，作者经三年半笔目双耕和许多次砚磨精雕，这部融文学性、史料性、学术性于一体，分列 19 章、70 万言的《戴逸传》的问世，无疑是史学界的一大幸事。感谢作者不仅以饱蘸深情的写真之笔为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塑像，更是用心建树了一座足以令人景仰的精神丰碑，上面镌刻着传主“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的人生信条。

二、脉络清晰，重点突出，亮点鲜明

虽说《戴逸传》有 70 万字容量，依旧只能部分记述传主的丰富人生。为此，作者在寻求脉络完整清晰的基础上，做到重点突出、亮点鲜明。《戴逸传》上卷 8 章，将传主一生作了贯通介绍，使读者对传主的家庭及少儿时期的聪慧好学，得到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传主瞿启甲和地方文化名人金叔远、杨毅庵等名师的殷殷教诲有所了解。抗战期间，传主又如何亲历亲见日军侵华暴行，激发家国情怀；抗战胜利后又如何辞别上海交大而毅然报考北大史学系，圆了他的文史梦。在北大，又如何得到胡适、郑天挺等诸多名师亲炙，求知问道，学业优进，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追求真理，接受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传主在遭到国民党特刑庭缉捕后，又如何得到胡适、郑天挺的保释营救；危急关头，地下党又如何帮助他逃离虎口，奔向光明，在华北大学开启崭新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传主如何在名师指导下，撰写出版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抗美援朝时期，传主又如何挥写万言长文《拆穿奥斯汀的谎话——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对日抗战期间的真面目》，在史学界初露锋芒。自 20 世纪 50 年代，传主受命投身近代史研究，在担负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不断潜心研究，丰富积累，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这既是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也为他的清史人生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到了 60 年代，传主两论“清官”的问世，则彰显了独立之思想、治史之理论、坚毅之风格，在史学研究领域旗帜鲜明，令人刮目相看。“文革”风云起，干校磨难多，史家成猪倌，初心志不移。随着中苏两国在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外交战线风激浪涌，处在人生困顿中的传主负重受命，在艰难困苦中寒暑四度，担纲完成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的编写工作，为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传主也借此机会对清代边疆史做了开创性研究，此书成为他的第二部代表作。

要完整反映传主的丰富人生，自然少不了伉俪琴瑟、天伦之乐、舐犊情深的真情纪实，也少不了师友交心、家乡情浓、衣山书香的感人故事，作者为此作了深入采访和细致整理，一一

付诸笔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传主始终铭记诸多前辈关于纂修清史的嘱托，他一方面抖擞精神、多方呼吁，敦请高层重视；一方面从基础工作抓起，培育人才，著书立说，运筹谋划。在史学研究领域，更是深思熟虑，首发宏论，早在 1979 年就发表《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破除了许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指导思想对历史研究的干扰与禁锢，在史学界引发巨大反响，为端正史学研究的方针方法和拓宽视野发挥了重要作用。传主为编纂《简明清史》更是呕心沥血，从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谋篇布局、史料运用、主题特色、社会效用等多个方面提出主导意见并领衔撰著。《简明清史》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赞誉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专著”，被教育部定为全国大学历史教科书，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这也成为传主在清史研究中的第三部代表作。时至 1992 年，传主第四部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出版。作者认为，此书是传主以国际视野研究中国封建盛世的力作，为此在《戴逸传》上卷专设一章，对传主是如何解析乾隆帝的“功”与“过”作了精扼介绍，并将乾隆帝陶醉于前代所不能企及的成绩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与欧美国家做横向的比较考察，尤其是将欧美各国在五个方面的重大事件做了勾勒梳理，而得出结论：“西方正在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而飞速前进，而中国的种种成就仿佛还在强化着封建的体制。两个不同的世界，其变化的性质和方向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究其原因，是乾隆帝“保守落后的思想及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政策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和深远、长久的影响”。作者认为《乾隆帝及其时代》无论从学术价值、史学专著的写作探索抑或欣赏趣味来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戴逸传》下卷 11 章是戴逸清史人生的重点，也是他晚年精治清史之高峰。为不负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前辈的期望与谋划，纂修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无愧前人、有益当代、遗泽后世的大型《清史》，传主一直萦念于怀，努力推动。经党中央、国务院郑重研究与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于 2002 年 8 月正式启动，并明确由传主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此后的 17 年间，传主经历了无数艰辛坎坷、跌宕起伏，终在他操舵之下，不倦不歇，稳健推进。这部汇聚了数千人无数智慧与心血，达 100 余卷、3000 多万字的《清史》终于在 2018 年完成送审稿，知情人、关心者无不为之额手称庆。

作为传记，该如何记述此项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文化工程之掌舵人是如何运筹帷幄与这部皇皇巨著的特色呢？作者为之谋划再三，确定以“《清史》总纂答客问”破题，通过传主之口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间对纂修清史的多次酝酿，盛世修史之必要，此番纂修清史之指导思想与规划，治史态度与方法，对修史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纂修清史所要达到之目的与价值等都一一阐明，以此提纲挈领，开宗明义。

传主作为掌舵人，其修史之思想定位与如何谋划关系到史稿之质量。作者不仅对新修《清史》在总体设计上有哪些“革故鼎新”予以聚焦关注，且分章对“通纪”“典志”“传记”“图录”“史表”这五大创新的缘由、入史内容的增删与功效、要求等作了详细介绍，为体现权威性，作者引用了传主对这些创新的具体论述，既使人感到高屋建瓴、匠心独运，又令人思路开朗、心悦诚服，深切感受到传主治史思想之科学与才识之高明，这些创新不但破除了既往修史传统之束缚，更彰显了这部《清史》的时代特色。

历古至今，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盛世修史的优良传统，认为具有记录历史发展、维系文化传承、增强民族认同的积极意义，也认识到修史者必须身心端正、广闻博见，唯有重视收集与深入研读文献资料，汲取营养，秉笔直书，才能精修良史。在《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后，传主召开十多次讨论如何纂修清史的座谈会，探讨规划、征求高见、汲取良策。他还亲赴台湾，一方面聆听台湾史学界的建言献策，一方面进行学术交流，真诚“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携起手来，共同纂修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在启动清史纂修主体工程的同时，

传主还积极主张与鼎力支持另一基础工程，即“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研究丛刊”“图录丛刊”编纂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不仅为纂修清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史料，也为后人研究历史打开了前所未见的史料宝库。为此，作者以“响必应之于同声”“五部丛刊垒础台”为题对上述两件同样具有创新意义的大事要事分撰两章作了具体介绍，其价值与功效足资品味。

作者不但对《清史》纂修的诸多创新做了翔实介绍，还就传主如何破解清代历史上的两大悬案，即光绪帝的猝死之谜和雍正帝是否矫诏篡位作了由表及里、由果溯因的深入剖析，以此对传主求真求实的治史态度和深邃思想、深厚功力作了印证。由此，不但体现了清史纂修的重要性、权威性，传记的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知识性也得到大大增强。

三、生动叙事，写人写心，求真求实

人物传记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其首要特征是真实，第二个特征是生动，唯真实而可信，唯生动而感人。传主戴逸是著名历史学家，且精治清史，成果显赫，要将传主写得不拔高不虚假，既传神又感人是不容易的，首先要对传主人生历程的不同年代，所经历的风雨阳光，治学治史的思想与成果以及为人处事的风格、美德等逐一熟悉并厘清，不但框架立得住，更要有血有肉有个性，这就需要梳理出无数个故事，然后量体裁衣。

善德为怀，有情有义。戴逸先生自幼在崇文尚德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认知文化是做人的修养、道德是生命的底蕴，对感恩二字更是念念于心。对此，作者告诉读者许多传主以善德待人、心存感恩的故事，涉及的人物有孤苦老妪、同窗至交，也有名师前辈、忘年小友。

“我的学习生涯非常幸运，小学是在常熟最好的小学塔前小学上的，是她培养了我读书的兴趣、爱好、习惯，还受到了写作的基础训练。而大学则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上的，是她叫我走上了史学之路！”传主称赞同读常熟孝友中学的陆荫乔是他“青年时代的启蒙者”“第一知友”。传主每当忆及在北大期间因投身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特刑庭抓捕一事，总会感激校长胡适出手相救：“是胡适救了我，这个不能忘！要不是他出面相救，我就会被关起来。”而北大秘书长兼史学系主任郑天挺给传主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当传主盲肠炎穿孔急需救治，是郑天挺作出“全力抢救，费用全免！”的指示，使传主得到及时抢救；当传主遭国民党特刑庭抓捕，又是郑天挺向胡适作了火速报告，并将胡适的担保信送到法庭，使传主免去了牢狱之灾。追怀往事，传主向作者坦诚相告：“北大的老师教给了我治学、治史、做人，尤要感谢、感恩的是郑天挺先生！”

当传主从北大撤离，潜往华北解放区，入学华北大学，以后又留校（中国人民大学）后，在从教治史的生涯中，传主接触的名师前贤更是以百计数，胡华、吴玉章、吴晗、黎澍、郭影秋、尚钺、任继愈……他赞誉“胡华同志是革命队伍中的杰出教师、宣传家，我听了他的课，深深为这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所折服”。传主有 6 年时间担任人大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对此他回忆说：“吴老严于律己、与人为善、朋友遍地、正义凛然、严谨治学、厚爱学生等高风亮节都汩汩注入自己的心田，照亮了自己的人生。”至于郭影秋，传主认为：“如果没有郭影秋，人大也许也就没有清史研究所，自己也许没有可能抓住清史编纂这个重大机遇，中国的清史编纂也许还要往后推多少年了。”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感谢作者将精挑细选的传主如何感恩的故事为读者娓娓道来，在一个个故事的真情叙述中，传主的形象也益发丰满。如果说上述故事都是与传主的学习、工作有关，那么关心孤苦老人陶桂芬的故事就更让人感受到传主对铁琴铜剑楼主的感恩和对楼主遗属的善德之怀。1978 年秋，传主回乡探母，无意间发现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瞿启甲的遗属陶桂芬竟艰难谋生度日，风啸

雨淋，备受凄苦。传主了解详情后，上书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细陈铁琴铜剑楼对国家的贡献和遗属的生活现状，很快，陶桂芬得到了每月 40 元的生活救济，生活稍有安顿。1982 年，传主再度探亲，了解到陶桂芬染病住院，且随着物价上涨，40 元生活费已入不敷出。传主回京后亲往北京图书馆，向任继愈馆长面陈详情并商谈，将 40 元生活补助费一下子提到 400 元，直至终老。作者将此故事细加详述，不但毫无冗长之感，反倒是感人至深，传主的精神美德也益发令人敬爱。

育才用才，视为己任。传主既是高等学府的人民教师，又是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始终将对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视作工作持续推进、事业后继有人的重要基础。作者写道："从 1952 年起到 2002 年戴逸先生走马上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不再从事教学工作为止整整 50 年间，他在讲台上开课教化的大学生，要以万数计；他教带的博士有黄爱平、杨念群等 30 位，全部是国内外教育、研究领域的骨干人才。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中国的各所大学里，凡是有开设历史课程的地方，就有戴逸先生的学生！"为了举证传主是如何重视人才培养，作者举了不少例子，其中有李文海、凌力、翁飞、张宏杰……每个人才的引进都倾注了传主的许多心血。而传主在"文革"落难之际，为福建林健写了 36 封信的故事，更是令人惊叹不已。要知道，林健当时只是一个对历史知识有所兴趣的"小毛孩"而已，他在读了《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后，有不少疑难之问而写信给正在江西余江养猪的戴逸先生请求教益。而戴逸在身边并无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常常落笔滔滔，不厌其烦地为他释疑解难，指导他如何求知并关心他的生活，以至于戴逸的每封回信都会成为林健居住地的众人传阅、拜读、学习、议论的热门话题，当地卫生院的浦院长在了解戴逸先生的古道热肠和满腹珠玑后不禁大发感叹："这些信不是一般的信，这是一位深陷困境的大学问家对你倾囊而出的珠宝，信中崭露的是一片灿烂之星，你再看这些字字句句，你看看，细细地看，然后再去细细琢磨，如此文采，如此思维，我们今天在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啊。"

学术精深，主见鲜明。《戴逸传》中，作者记述了不少传主如何孜孜好学、潜心学问，在重大学术问题上又有自己独立主张的故事，使人感受到这是传主一辈子的传统与美德，品读这些故事和经验，总给人弥足珍贵、永不过时的感觉。其中有个故事极具典型意义。1954 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中国历史研究班，其中的中国近代史课是首次开设的新课程，没有经验可资借鉴，教学资料也很少。传主说："说实在话，当时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知识极为缺乏，只读过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书，远没有我在马列主义理论、党史和中国古代史方面读的书多，但是为了工作需要，我转入了中国近代史专业，一切几乎都要从头学起。"传主以开荒田的精神，埋首研读各种图书资料，调动脑海里积累的各项知识，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洋务运动等重要史事更是深刻剖析。随着讲课稿的不断丰富、提升与成熟，他又据此写出了《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为了有别于以往介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传主有自己的学术主张，不仅将中国近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广阔背景内加以研究，更是自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形成了许多前人从未有过的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此书一经出版，就得到史学界的关注与好评，认为不但成果新硕，且"带有新的作风，有一些突出的优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左"的思想之影响和干扰，一些学术意见会被人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上纲上线、无情打击。如 50 年代对历史学家尚钺的批判，60 年代对吴晗所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其中两件大事。传主认为："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不是政治上的不同政见，个别理论观点的失误也不能无限地上纲上线。必须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这样做，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才能够繁荣昌盛起来。"针对有人别有意图地批判历史上的"清官现象"，提出"'清官'比贪官更反动"的观点，传主旗帜鲜明地指出：

“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各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够给这一历史现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传主在中国史坛上的正直形象再次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他的命运也因此变得起伏不定。

作者注意到传主在治学治史方面卓有建树，积累有许多宝贵经验，为传承广大，有益后人，就择其要者由传主亲作介绍。“古人认为优秀的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这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用功，才能成为合格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至于说到如何做学问，我认为做学问没有捷径，结合我多年求学、治学的感受来说，大约有‘勤’‘苦’‘乐’‘迷’四个境界，它们相互贯通筑起了一条成才的道路。”看似云淡风轻，真正做到却需要日复一日的艰辛实践，传主的无数个勤勉好学的故事告诉读者成功背后的真谛。

不忘初心，勇担使命。2002 年 8 月，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戴逸先后数十次接受传媒采访。从一次次访谈中，传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间对《清史》纂修的谋划到正式启动的曲折过程、《清史》纂修工程的指导思想、作为领衔者的使命责任与决心都作了坦诚介绍：

> 我国有盛世修史的传统，现我们正在向盛世迈进，应该抓住时机，完成前人的夙愿，纂修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清史》。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经历过挫折和困难，但总体而言，整个国家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努力实现政通人和，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可以也应该把大型《清史》的编纂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
> 阅读和研究清史，展示 300 年封建王朝的际遇和命运，匆忙地奔驰过兴、盛、衰、亡的轮回，从盛世的辉煌走向末世的凄凉，其间的经验教训使人感慨，发人深省。
>
> 纂修《清史》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经世致用”，借鉴清代的成功经验，规避清代的错误、教训。
>
> 清史研究是自己的工作、专业与职责，我刻苦自励，以至诚之心力求敬业，用探索精神去追求未知，用怀疑精神去发现问题，用勤奋精神去搜寻资料，用科学精神去分析疑难，用理性精神去阐释历史，在客观历史千变万化的运动发展中寻求其规律，真实地、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
>
> 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
> 更令人欣慰的是，习近平同志两次对《清史》编纂工作做了批示，要求我们加快进度，保证质量，并直接以电话做了指示，使我们备受鼓舞和鞭策。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关心支持下，《清史》的编纂和研究一定会在璀璨的百花园中更加夺目鲜艳！

作者引录传主戴逸先生在《清史》纂修过程中所发表的种种肺腑之言，既原汁原味地体现了“真实”二字，更使人感受到作为《清史》纂修工程掌舵人始终牢记使命的孜孜期盼，高屋建瓴的指导思想，“经世致用”的治史理念，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读之思之，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大师之风，山高水长！

孟东明先生所作《戴逸传》得到了传主的肯定：“篇幅宏大，结构雄伟，文笔瑰丽，笔底功夫深厚，故事真实具体……”这些优长之处自是有目共睹，感同身受。但若以追求完美的挑剔之眼，也稍有瑕疵，如上下卷的风格还不尽统一，少数篇章的文字量也有失衡之嫌，文学性、学术性、史料性完美结合的精准把握留有完善空间。但瑕不掩瑜，综览全书，《戴逸传》的影响力、感染力、生命力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渐行渐美；作为戴逸先生的首部传记，其开山之作的意义与价值必定功不可没，有目共睹。